

新中國誕生前的 文壇清剿運動

• 商昌寶

進入1948年，中國大陸的政治和軍事形勢發生急劇轉變，國民黨及其軍隊的衰敗之相盡顯，而一直處於弱勢地位的共產黨及其軍隊一躍而升為強勢一方，轉入反攻階段。為了配合形勢發展的需要，避居香港的左翼文人以上海出版的《文匯報》、《文萃》和香港出版的《華商報》、《群眾》、《大眾文藝叢刊》以及《小說》月刊、《文藝生活》等媒介為陣地，發起了有目的、有針對性的文壇清剿和整肅運動。閱讀當年那些充滿激情、聲色俱厲的討伐文字，仍能感受到其中的硝煙與戰火味。在被批判的對象中，既包括胡風、路翎、舒蕪、姚雪垠、臧克家、駱賓基、李廣田等左翼「異己」作家或「革命同路人」，也包括所謂的主張「唯生主義文藝」和「文藝再革命」的徐仲年，標榜「文藝的復興」的顧一樵，宣揚「為藝術而藝術」的朱光潛、梁實秋、沈從文，以及「擺出四大家族奴才總管面目」的易君左、蕭乾、張道藩、潘公展等。另外，還有未被點名的所謂「黃色」的買辦文藝，色情的、趣味惡劣的、鴛鴦蝴蝶的……。當然，細數歷史文獻可以發現，作為自由主義作家的朱光潛、沈從文和蕭乾等三人卻「力壓群雄」而成為左翼火力的集中靶子。何以故？本文將以回到歷史現場的方式再現這一文壇恩怨與糾葛。

進入1948年，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一躍而升為強勢一方。為了配合形勢發展的需要，避居香港的左翼文人發起了有目的、有針對性的文壇清剿和整肅運動，而自由主義作家朱光潛、沈從文和蕭乾「力壓群雄」成為左翼火力的集中靶子。

一 對朱光潛的清剿及過往糾葛

1948年3月1日創刊的《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中，載有兩篇與朱光潛直接相關的文章，即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和邵荃麟的〈對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檢討·批判·和今後的方向〉。郭沫若在文中將朱光潛定名為「藍色作家」，並予以批判道^①：

當今國民黨當權，為所欲為的宰治着老百姓，是不是黨老爺們都是「生來演戲」的，而老百姓們是「生來看戲」的呢？照朱教授的邏輯說來，又能夠得出一個答案，便是「是也」！認真說，這就是朱大教授整套「思想」的核心了，

他的文藝思想當然也就是從這兒出發的。由他這樣的一位思想家所羽翼着的文藝，你看，到底是應該屬於正動，還是反動？

邵荃麟則批評道：「……更主要的，是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幫兇和幫閒文藝。這中間有朱光潛、梁實秋、沈從文之流的『為藝術而藝術論』……這些人，或則公然擺出四大家族奴才總管的面目，或者扭扭捏捏化裝為『自由主義者』的姿態，但同樣掩遮不了他們鼻子上的白粉。……我們決不能因其脆弱而放鬆對他們的抨擊。因為他們是直接作為反動統治的代言人的。」^②稍後，在5月1日出版的《大眾文藝叢刊》第二輯中，邵荃麟再次撰文批判道^③：

這一年來，我們看過了許多御用文人的無恥文章，但我們還找不出一篇像朱光潛在《周論》第五期上所發表的〈談群眾培養怯懦與兇殘〉那樣卑劣，無恥，陰險，狠毒的文字。這位國民黨中央常務監察老爺，現在是儼然以戈培爾的姿態在出現了。

我們要問一下朱光潛：當你們還騎在人民頭上的時候，當你們主子還在用達姆彈和裝甲車向徒手的人民衝鋒的時候，你這種撒嬌撒賴的做法，這種對人民群眾無恥的誣蔑，是甚麼作用呢？你以為你主子的瘋狂屠殺還不夠徹底嗎？你以為你的挑唆還不夠盡力嗎？

但你卻比他們陰毒，因為你是裝着一副正人君子的臉孔，擺着大學院長的身份，在你毛筆管下颼颼的閃出殘忍的殺機，這正是你們御用文人們殺人不見血的最惡毒的地方。……你，朱光潛，就是這樣一種角色！

這樣的批判還包括馬列主義美學家蔡儀1948年8月撰寫的長文〈朱光潛論〉。文中，蔡儀將朱光潛的美學和文學理論貶為「封建士大夫的舊的理論」、「把洋大爺的東西拿來撐撐腰，支持門面」，表現的是「文藝上的中體西用論」^④。

郭沫若、邵荃麟、蔡儀等左翼文人緣何如此兇狠地批判一個從事文學和文學研究工作的大學教授呢？或者說，朱光潛究竟闖了甚麼「禍」，會令這些人如此大動干戈呢？

考察歷史可知，朱光潛與左翼文人的「交惡」應該從1937年《文學雜誌》創辦算起。在發刊詞中，朱光潛這樣寫道：「中國所舊有的『文以載道』一個傳統觀念很奇怪地在一般自命為『前進』作家的手裏，換些新奇的花樣而安然復活着。文藝據說是『為大眾』，『為革命』，『為階級意識』。」顯然，朱光潛在這裏的批判矛頭是指向左翼文藝。在批評的同時，他還倡言道：「你如果愛自由，就得尊重旁人的自由。在衝突鬥爭之中，我們還應維持『公平交易』與『君子風度』。」^⑤顯然，對於左翼文人來說，朱光潛的上述言論是不受歡迎的。不過，隨着抗日戰爭的爆發，《文學雜誌》被迫停刊，預期中的批評和清算也暫時被擱置了。

但《文學雜誌》在1947年6月復刊後，朱光潛在〈復刊卷首語〉中再次申明《文學雜誌》復刊後的指導思想，並有所影射地寫道^⑥：

文學上只有好壞之別，沒有甚麼新舊左右之別。……市場上許多競爭的惡伎倆不幸久已闖進文壇，大家都想賣獨家貨，以為打倒旁人就可以抬高自

朱光潛與左翼文人的「交惡」應該從1937年《文學雜誌》創辦算起。在發刊詞中，朱光潛的批判矛頭直指左翼文藝。不過，隨着抗日戰爭的爆發，《文學雜誌》被迫停刊，預期中的批評和清算也暫時被擱置了。

己，於是浪費精力於縱橫捭闔，鬧店罵街。其實這不僅是浪費精力，也顯得趣味低級。

朱光潛文中的用詞與心機，明眼人一眼便能看出其中的究竟。這種含沙射影式的批評還體現在他的〈學潮的事後檢討〉一文中，他說：學潮中少數操縱者「挾有某政黨背景而在背後操縱利用，以求達到政治鬥爭目的的」，他們「假民主的名號，作反民主精神的行動」^⑦。稍後，朱光潛又在〈看戲與演戲——兩種人生理想〉一文中針對斯蒂文森 (Robert L. Stevenson) 的散文〈步行〉中的一段話（「說到究竟，能拿出會遊行來開心的並不是那些扛旗子遊行的人們，而是那些坐在房子裏眺望的人們。」），有感而發道：「我們看了那出會遊行而開心之後，也要深心感激那些扛旗子的人們。假如他們也都坐在房子裏眺望，世間還有甚麼戲可看呢？」^⑧從這些綿裏藏針的話中可以判斷出，郭沫若為甚麼會如此敏感於「看戲」和「演戲」這一形象比喻了。

如果說，這幾篇文章都是朱光潛藉曲筆來表達自己的一種觀點，那麼接下來的〈蘇格拉底在中國（對話）——談中國民族性和中國文化的弱點〉一文，則直接體現了他對時局的進一步關注和判斷。他藉文中的虛擬人物林、褚兩先生的口說：「國內有兩個大政黨，都不體念人民的痛苦，一味用私心，逞意氣，打過來，打過去，未建設的無從建設，已建設的盡行破壞。」他又藉蘇格拉底的話說：「這是狂熱主義 (fanaticism)。……最近的例子是德國、意大利和日本。他們要違背人性，發揮獸性，所以都受了他們所應受的懲罰。我看你們中國現在許多做政治鬥爭的人們也還在蹈以往的覆轍。他們正在中宗教熱忱的毒，他們不尋求光明而在玩火。」^⑨朱光潛的這些言論無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面對中國的現狀所作的個人思考，而這些思考也無疑會刺痛一些左翼文人。

朱光潛對於時局的態度並沒有停留在批判表面上。在稍後的〈自由份子與民主政治〉一文中，他將這種思考深入下去，他說：

尤其是在目前的中國……他們對於國家重要問題自然是很客觀地就國家全局着想，他們所見到的自然是公是公非而不是黨是黨非。所以在像中國這樣的國家裏，真正能代表民意的是自由份子。自由份子的思想既然比較穩健純正而又富於代表性，它在一個民主國家裏就應該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保持平衡的力量。

他還談及，目前的中國因為缺少自由份子的平衡，就只能是毫無結果的衝突。為此他斷言：「我敢說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來，中國真正的民意還要藉社會上少數優秀的自由份子去形成，去表現。」^⑩這就表明，朱光潛等精英自由主義者已經對國共兩黨都表示失望，而寄希望於「第三種力量」。當然，這種言論對正忙於內戰的兩黨來說，無疑都是不中聽的。

隨後，朱光潛又針對國內頻繁發生的聚眾暴亂事件撰寫了〈談群眾培養怯懦與兇殘〉一文，指責那些團體份子混在群眾中，不負責任地做「匿名揭帖」、「含沙射影」的下流事；表面上是靠群眾掩護，而實際卻是「怯鼠馴羊」。為此他倡言

朱光潛的言論無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面對中國的現狀所作的個人思考，而這些思考也無疑會刺痛一些左翼文人。朱光潛等精英自由主義者對國共兩黨都表示失望，而寄希望於「第三種力量」。

道：「今日世界所需要的是清醒，和愛與沉着，而今日群眾所走的是瘋狂，怨恨浮躁，與怯弱的路。回頭是岸，讓我們禱祝捲在潮流中的人們趁早醒覺！」^⑩如前所述，正是在這篇文章的直接刺激下，邵荃麟以〈對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和〈朱光潛的怯懦與兇殘〉作出回應，批評朱光潛的文藝思想是「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幫兇和幫閒文藝」，並將其斥為「反動統治的代言人」。

即使郭沫若等人拋出集束式的大批判，朱光潛依然我行我素，繼續撰寫了大量批判文章；甚至在戰局已發生轉變之際，仍撰寫系列政論文章，繼續標舉自由主義主張。在這些文章中，最能夠體現他這一時期的思想精華的是〈自由主義與文藝〉一文。他寫道^⑪：

自由是文藝的本性，所以問題並不在於文藝應該不應該自由，而在我們是否真正要文藝。……因此，我反對拿文藝做宣傳的工具或是逢迎諂媚的工具。文藝自有它的表現人生和怡情養性的功用，丟掉這自家園地而替哲學宗教或政治做喇叭或應聲蟲，是無異於丟掉主子不做而甘心做奴隸。損人利己是人類的普遍的劣根性，宗教家和政治家之流要威迫利誘文藝家做他們的奴隸，或屬情理之常；而文藝家自己卻大聲嚷着：「文藝本來只配做宗教，道德和政治的奴隸；做奴隸是文藝的神聖的義務！」這就未免奴顏屈膝而恬不知恥了。

可見，朱光潛與左翼文藝界的「交惡」由來已久，這也就是郭沫若等人為何如此大動干戈的根源所在。

二 對沈從文的清剿及過往糾葛

最先對沈從文發出批判之聲的是邵荃麟。他在1948年2月發表的〈二丑與小丑之間——看沈從文的「新希望」〉中，以戲曲舞台上的丑角形象開篇，稱沈從文扮演的角色是在二丑與小丑之間的一種比二丑低、卻比小丑高、替二丑說話的丑角，是二丑的二丑，或稱為「三丑」。他還針對沈從文的「中間路線論」進一步批判說^⑫：

沈從文所謂「綏靖時局，均衡兩大」，明明白白說出了這個活動的目標。從目前一些偽自由主義的報刊上，正可看出一些他們搔首弄姿的風采。他們顯然是想拾起那幅破爛的「中間路線」旗幟，來「黏合」一些對「中間路線」尚存幻想的份子。而沈從文則在這裏不過是扮演一個二丑以下的角色。但是由於他技術的低劣，卻反而更清楚地露出他們的嘴臉了。

隨後，郭沫若便在其名篇〈斥反動文藝〉中將沈從文定性為「作文字上的裸體畫，甚至寫文字上的春宮」的「桃紅色作家」，說他「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軟化人們的鬥爭情緒」，並且進一步批評說^⑬：

即使郭沫若等人拋出集束式的大批判，朱光潛依然我行我素，繼續撰寫大量批判文章；甚至在戰局已發生轉變之際，仍撰寫系列政論文章，繼續標舉自由主義主張。

他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着。在抗戰初期全民族對日寇爭生死亡存亡的時候，他高唱着「與抗戰無關」論；在抗戰後期作家們正加強團結，爭取民主的時候，他又喊出「反對作家從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也正是鳳凰燬滅自己，從火裏再生的時候，他又裝起一個悲天憫人的面孔，謚之為「民族自殺悲劇」，把全中國的愛國青年學生斥為「比醉人酒徒還難招架的衝撞大群中小猴兒心性的十萬道童」，而企圖在「報紙副刊」上進行其和革命「游離」的新第三方面，所謂「第四組織」。（這些話見所作〈一種新希望〉，登在去年十月二十一日的《益世報》。）這位看雲摘星的風流小生，你看他的抱負多大，他不是存心要做一個摩登文素臣嗎？

《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還刊載了馮乃超的一篇批判文章。馮乃超在文中將沈從文的〈芷江縣的熊公館〉描述為抒寫地主階級的「極一時人間豪華富貴」的生活，稱道地主「人格的素樸與單純，悲憫與博大，遠見和深思」，並批評說⑥：

地主階級的弄臣沈從文，為了慰娛他沒落的主子，也為了以緬懷過去來欺慰自己，纔寫出這樣的作品來；然而這正是今天中國典型地主階級的文藝，也是最反動的文藝。在這篇作品裏，沈從文對於其自己的身份和「靈魂與人格」作了一次最清楚的畫供。

考察歷史不難發現，沈從文與左翼文人的糾葛也是源遠流長。沈從文的人生追求和文學主張說到底不過是自由主義，而正是這樣的自由主義使他對所謂的「文壇」很反感。他曾說，所謂文壇不過是現代政治下一個縮影，其中，「派別不同，則相互輕視；同流合污，則人皆天才」，「善吹如革命文學家，仍然不外想賺錢」⑦。為此，他以一副自由主義者的姿態頻繁地發起攻擊，同時也經常遭到「文壇」各集團、幫派的批判、「掃蕩」。

在涉足文壇的二十多年中，筆墨官司構成沈從文文學生涯的一個亮點。他曾在1947年的一個未完稿中總結說⑧：

民十五（此處年代有誤，應為1925年，即民國十四年——編者）時剛學習執筆，就被一夥在北平的甚麼社員倒過，我自己就不曾料到。民十八在上海又被一團體指定一某兄由檢討而揚棄過。且宣布必倒。我也想不到這檢討是甚麼意義。到二十三年又被一群生力軍戰戰，三十年左右，桂林又有一些遠距離掃蕩，三十四五年在昆明又有些近距離掃蕩。一共約二十年光景，次數不為不多，而且照例是團體性，再加上一堆文壇消息，不可謂不實力雄厚。

沈從文在這裏的概括應該是比較全面的，只是有些內容含糊一些，沒有具體指明被批判的內容。

不過，郭沫若在〈斥反動文藝〉中卻為其做了註腳和命名，即「色情文學傾向論」（實為「現代派文學嘗試」）、「與抗戰無關論」（實為「反文學宣傳論」）、「反對作家從政論」、「第四組織論」（也被稱作「中間路線論」、「新第三方面運動論」）。

沈從文對所謂的「文壇」很反感。他認為所謂文壇不過是現代政治下一個縮影。為此，他以自由主義者的姿態頻繁地發起攻擊，也經常遭到「文壇」各集團、幫派的批判、「掃蕩」。

當然，此處未被提及的還有「禁書問題論」、「海派論」、「文人相輕論」、「反差不多論」，以及他無辜被批評的「《戰國策》法西斯問題」等。可以說，沈從文與文壇眾多高手都過過招，包括魯迅、茅盾、蘇汶等，當然也少不了郭沫若。

沈從文最早開罪郭沫若是在1930年，在沈從文一連串發表的十多篇作家論中，其中就有一篇題為〈論郭沫若〉。他在文中說：「郭沫若可以說是一個詩人，……但是，創作〔意指小說〕是失敗了」，他的筆「奔放到不能節制」，「不能節制的結果是廢話」，「看他的小說，在文字上我們得不到甚麼東西」。文章最後又總結說：「讓我們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詩人上，煽動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小說方面他應當放棄了他那地位，因為那不是他發展天才的處所。」^⑧他還在隨後的〈論中國創作小說〉、〈文藝政策〉探討等文中點名對郭沫若進行批評。當然這些言論尚屬純文藝方面的批評，或者可以說是沈從文與郭沫若之間的私仇。不過，他們也有「公仇」。

沈從文最早開罪郭沫若，尚屬純文藝方面的批評，或者可以說是沈從文與郭沫若之間的私仇。不過，他們也有「公仇」。郭沫若曾在「文協」改選時暗中把沈從文從理事會的名單中鈎掉。

抗戰勝利後，沈從文出於對國事的關心，接連發表了幾篇時論文章，在國內政界和文化界產生反響。這其中包括，他在接受姚卿祥的訪談中「筆走偏風」，除譏諷鳳子穿着豔麗衣服「跑到蘇聯大使館去朗誦詩」；丁玲「到鐵礦上去體驗工人生活，寫了文章還要請工人糾正」；何其芳「隨政治跑」等「出風頭，鬧運動」的現象外，也捎帶批評了郭沫若「飛莫斯科」^⑨。同時，他還針對國共內戰的現實情況撰文批評說：國共雙方只一味「玩火」，「燒死他人時也同時焚毀了自己」，「燒到後來，很可能甚麼都會變成一堆灰，剩下些寡婦孤兒」，從而上演「民族自殺的悲劇」^⑩。他在〈一種新希望〉中提出了「政治上第三方面的嘗試」和「『第四組織』的孕育」，主張通過「學術獨立」來消除受鼓動的青年學生的猴兒性心理，「重造這個國家」^⑪。

對於沈從文的「挑釁」，郭沫若從1938年開始便先後在〈抗戰與文化問題〉、〈抗戰以來的文藝思潮〉、〈新文藝的使命——紀念文協五周年〉、《洪波曲》、〈新繆斯九神禮讚〉等著作中，或影射或點名地予以反擊。而且他還曾在「文協」（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改選時暗中把沈從文從理事會的名單中鈎掉^⑫。幾乎在同時，其他左翼作家也都紛紛撰文圍剿，至1948年國共戰事漸趨明朗之時，形成對沈從文的全面清算之勢，並一直延續到1949年初。

三 對蕭乾的清剿及過往糾葛

1948年，胡繩在潘漢年主持的《華商報》上發表批判文章。文中稱：《大公報》「向來以小罵大幫忙著名」，現在「無非是替他的主人來施行這種無恥的宣傳戰術」，它所謂的「填土工作」就是「妄想支撐搖搖欲墜的反動大廈」，「為獨裁統治者效勞」^⑬。文中雖未具體點名，但顯然指向蕭乾。

當然，批判蕭乾最猛烈的火力還是來自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郭沫若在文中將蕭乾判為最為反動的「黑色作家」，並在「判詞」中這樣寫道^⑭：

甚麼是黑？人們在這一色下最好請想到鴉片，而我想舉以為代表的，便是《大公報》的蕭乾。這是標準的買辦型。自命所代表的是「貴族的芝

蘭」，其實何嘗是芝蘭又何嘗是貴族！舶來商品中的阿芙蓉，帝國主義者的康伯度而已！摩登得很，真真正正月亮都只有外國的圓。高貴得很，四萬萬五千萬子民都被看成「夜哭的娃娃」。這位「貴族」鑽在集御用之大成的《大公報》這個大反動堡壘裏盡量發散其幽縵，微妙的毒素，而與各色的御用文士如桃紅色小生，藍衣監察，黃幫弟兄，白面嘍囉互通聲息，從槍眼中發出各色各樣的烏煙瘴氣。一部分人是受他麻醉着了。就和《大公報》一樣，《大公報》的蕭乾也起了這種麻醉讀者的作用，對於這種黑色的反動文藝，我今天不僅想大聲急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

御用，御用，第三個還是御用，
今天你的元勳就是政學系的大公！
鴉片，鴉片，第三個還是鴉片，
今天你的貢煙就是《大公報》的蕭乾！

郭沫若雖然對朱光潛和沈從文也給予了尖酸刻薄的批判，並分別斥之為「藍色」和「桃紅色」，但是對蕭乾的批判似乎要更嚴重一些，或者用李輝的話說，就是「詩人特有的激情和厭惡情緒」^⑤更強烈一些。還不僅於此，郭沫若於3月14、15日在《華商報》上先後發表〈自由主義親美擁蔣，「和平攻勢」配合美援〉、〈提防政治扒手〉等文章。在後文中他寫道：「我們已經明確地知道TV宋〔宋子文〕出了二百六十億，政學系的宣傳機構派出了開路先鋒蕭乾。蕭乾被派去做《新路》的主編，這和得了大量美金外匯到香港來進行宣傳攻勢，是有密切聯繫的……他們已經將一部分過去不曾和國民黨合作過的文化 and 文藝工作者扒過去了，這分明是錢昌照、蕭乾經手扒過去的。」^⑥在短短的一個月內，郭沫若連發三篇文章痛斥蕭乾，足見這其中積怨之深。

1946年，隨着抗戰的慘勝，遊歷歐美七年的蕭乾得到《大公報》的電邀，迫不及待地回到中國。蕭乾的回歸為《大公報》、也為整個文化輿論界吹來一股清新的風，他以「塔塔木林」為筆名撰寫了《紅毛長談》的系列雜文，對包括國共內戰等諸多問題進行了辛辣的嘲諷，其中的〈法治與人治〉、〈中古政治〉、〈半夜三更國際夢〉等篇意義深遠，影響廣泛，一時間令文化輿論界刮目相看。連他的恩師沈從文也讚不絕口，為此還專門撰文〈懷塔塔木林〉予以稱讚。蕭乾此後接連撰寫了〈玫瑰好夢〉、〈神遊大西南〉、〈二十年後之南京〉、〈中國舞台的歧途〉、〈中國音樂往哪裏走？〉等諸多文章，延續着他的不偏不倚、左右開弓的作風。

1947年，為紀念五四文藝節，由他主筆撰寫了〈中國文藝往哪裏走？〉的社論，文中不無影射地寫道^⑦：

每逢人類走上集團主義，必有頭目招募嘍囉，因而必起偶像崇拜作用。此在政治，已誤了大事；在文壇，這現象尤其不可。真正大政治家，其宣傳必仰仗政績；真正大作家，其作品便是不朽的紀念碑。近來文壇上彼此稱公稱老，已染上不少腐化習氣，而人在中年，便大張壽宴，尤令人感到暮氣。……紀念五四，我們應革除文壇上的元首主義。

郭沫若雖然對朱光潛和沈從文也給予了尖酸刻薄的批判，並分別斥之為「藍色」和「桃紅色」，但是對蕭乾的批判似乎要更嚴重一些——將他判為最為反動的「黑色作家」。

他同時還寫道：「近來有些批評家對於與自己脾胃不合的作品，不是就文論文來指摘作品缺點，而動輒以『富有毒素』或『反動落伍』的罪名來抨擊摧殘。」在批評的同時，他還主張對文壇「寄以民主的期望」，即「容許與自己意見或作風不同者的存在」，在「『法定』範圍內」，作家「應有其寫作的自由，批評家不宜橫加侵犯」，應保持文藝欣賞上的「民主的雅量」。他還設想了理想的文壇：「在那裏，平民化的向日葵與貴族化的芝蘭可以並肩而立」^②。可以說，這篇文藝宣言雖是代表《大公報》立言，但其中也明確體現出蕭乾1930年代以來所追求的自由主義文學思想。

針對郭沫若對蕭乾所下的「判詞」，以往的研究者都過於看重文中「稱公稱老」和「大張壽宴」的張力，即過於強調個人恩怨而忽略其他要素。當然，這也是蕭乾本人刻意強調的結果。蕭乾在事後多次說起：「這次太不慎重。只幾個字，開罪了文藝界領導人。」^③蕭乾的愛人文潔若也回憶證實說：「稱公稱老」這四個字「捅了馬蜂窩」，蕭乾當着自己的面說：「四個字恨上一輩子。」^④客觀地說，「稱公稱老」、「大張壽宴」以及「革除文壇上的元首主義」等敏感話語，確實可能成為〈斥反動文藝〉的背景資料，因為該文中使用的「反動」、「貴族」、「芝蘭」、「毒素」等都是蕭乾原文中的用語。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細讀蕭乾這一時期的文章便可發現，郭沫若的「判詞」是一個合力的結果，而並非僅僅是那一篇文章和那「四個字」。

如在〈人道與人權〉中，蕭乾寫道：「多少人嚷中國問題只是國共問題，多少人嚷中國問題只是憲法問題。綜觀各大戰場的憑弔記，多少對付同胞的殘暴都是西洋人對敵人所行不出的。」^⑤在〈吾家有個夜哭郎——五千歲這個又黃又瘦的苦命娃娃〉中，他形象地比附說：「馬克思也好，荀子也好，衣食足了甚麼都好說。衣食不足，……這個娃娃依然會喘動起來」，說到底，中國「眼前的問題根本是奶汁，奶汁，更多的奶汁」^⑥。如果與郭沫若「判詞」中的「夜哭的娃娃」相聯繫，可以判定，郭文顯然也受到此文的影响。而且，那句經典的「怒吼」：「御用，御用，第三個還是御用」與「鴉片，鴉片，第三個還是鴉片」，無論從修辭手法上，還是詩句韻律上，都可以看作是「奶汁，奶汁，更多的奶汁」的模仿或借用。

還有，1948年1月以來，蕭乾參與了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及其機關刊物《新路》的創辦，公開倡導在中國施行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文化民主，以國共之外的「第三種立場」相標榜。這對於正躊躇滿志的香港左翼文化界來說，其挑戰性和打擊性是絲毫不弱的。在〈自由主義者的信念——關妥協騎牆中間路線〉一文中，蕭乾將國民黨和共產黨喻作白色和紅色，而將自由主義者喻作「灰色人物」，並解釋說：所謂「灰色」，是因為「他們白不夠白，紅不夠紅，對兩個極端都不熱中，而暗裏依然默禱着紅白遲早合龍」。為了避免「中國的前景更為模糊」，「我們在此為這『灰色人物』的臉相繪一輪廓，是希望除了把他的五官明晰化些之外，並把那『灰色』根本除去。因為我們信念中的自由主義既不模糊，也不是灰色的」^⑦。如果將這些內容及語詞與郭沫若「判詞」中的「幽縵」、「微妙」、「烏煙瘴氣」等相對照，不難看出，郭沫若的「紅、藍、黃、白、黑」的「五色畫像」正是有感於蕭乾的「紅、白、灰」，只不過是做了適當的發揮而已。蕭乾在文中還對去除「灰色」後的「自由主義」做了明確界定^⑧：

1948年，蕭乾參與了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及其機關刊物《新路》的創辦，公開倡導在中國施行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文化民主，以國共之外的「第三種立場」相標榜。這對於正躊躇滿志的香港左翼文化界來說，其挑戰性和打擊性是絲毫不弱的。

自由主義不是一面空泛的旗幟，下面集合着一簇牢騷專家，失意政客。自由主義者不是看風使船的舵手，不是冷門下注的賭客。自由主義是一種理想，一種抱負，信奉此理想抱負的，坐在沙發上與挺立在斷頭台上，信念得一般堅定。自由主義不是迎合時勢的一個口號，它代表的是一種根本的人生態度。這種態度而且不是消極的。不左也不右的，政府與共黨，美國與蘇聯一起罵的未必即是自由主義者。

隨後，蕭乾闡述了自由主義的五條基本信念：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並重；相信理性與公平，反對意氣、霸氣與武器；以大多數的幸福為前提；贊成民主的多黨競爭制；任何革命必須與改造並駕齊驅^①。接着，他又分別發表了〈華盛頓精神的不朽——頌埃森豪元帥的風度〉和〈政黨·和平·填土工作——論自由主義者的時代使命〉，立場鮮明地提出自由主義者在中國當下的使命、任務和地位，要與共產黨和國民黨來爭奪中國的領導權^②，這讓左翼文化界非常痛恨。

茅盾在《我走過的道路》中記述：「為了反對這股『新的第三方面』攪起的『中間路線』逆流，四八年上半年，我們開展了對『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的批判。流亡到香港的文化界人士郭沫若、馬彥倫、鄧初民、侯外廬、翦伯贊、曾昭掄等都發表談話或寫文章，指出要『提防政治扒手』，要『戳穿美蔣新的政治陰謀』。」^③可見，蕭乾與郭沫若等左翼文人的確「交惡」很深，這也就是他何以遭受猛烈批判的原因所在。

左翼文人的大批判和毛澤東帶有預見性的最後宣判，都明白地昭示自由主義作家是不容於新政權和國家的。而左翼作家的大批判可以看作1949年後歷次政治運動的預演，同時奠定了後來的文風和基調。

四 結語

1948年前後的文壇清剿運動儘管因為左翼作家紛紛「北上」迎接勝利而匆忙收兵，但是作為共和國未來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卻不肯就此罷休。在1949年戰局已經基本確定之時，他接連發表了〈丟掉幻想，準備戰鬥〉、〈別了，司徒雷登〉、〈為甚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等多篇總結性文章。從歷史的結果看，無論是以《大眾文藝叢刊》為代表的左翼文人的大批判，還是毛澤東帶有預見性的最後宣判，都已經明白地昭示，自由主義作家是不能被容留於新的政權和國家。從另一方面來看，1948年前後左翼作家的批判可以看作1949年後歷次政治運動的一個預演，同時也奠定了後來的文風和基調。

註釋

①②③ 郭沫若：〈斥反動文藝〉，《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文藝的新方向〉（1948年3月1日），頁21；19；21。

② 荃麟：〈對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檢討·批判·和今後的方向〉，《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頁16-17。

③ 荃麟：〈朱光潛的怯懦與兇殘〉，《大眾文藝叢刊》，第二輯，〈人民與文藝〉（1948年5月1日），頁27-28。

- ④ 蔡儀：〈朱光潛論〉，載《美學論著初編》，上冊（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頁444。
- ⑤ 朱光潛：〈我對於本刊的意見〉，《文學雜誌》，第1卷第1期（創刊號），1937年5月，封頁。
- ⑥ 朱光潛：〈復刊卷首語〉，《文學雜誌》，第2卷第1期（復刊號），1947年6月，封頁。
- ⑦ 朱光潛：〈學潮的事後檢討〉，《獨立時論集》，第1集（1947年6月）。引自《朱光潛全集》，第九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頁254-55。
- ⑧ 朱光潛：〈看戲與演戲——兩種人理想〉，《文學雜誌》，第2卷第2期（1947年7月），頁18。
- ⑨ 朱光潛：〈蘇格拉底在中國（對話）——談中國民族性和中國文化的弱點〉，《文學雜誌》，第2卷第6期（1947年11月），頁2、16。
- ⑩ 朱光潛：〈自由份子與民主政治〉，《香港民國日報》，1947年12月22日。
- ⑪ 朱光潛：〈談群眾培養怯懦與兇殘〉，《周論》，第1卷第5期（1948年2月），頁4。
- ⑫ 朱光潛：〈自由主義與文藝〉，《周論》，第2卷第4期（1948年8月），頁10。
- ⑬ 荃麟：〈二丑與小丑之間——看沈從文的「新希望」〉，《華商報》，1948年2月2日。
- ⑭ 乃超：〈略評沈從文的「熊公館」〉，《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頁86。
- ⑮ 楊南生：〈通訊〉（即沈從文致楊南生信，《沈從文全集》未收錄），《朝曦》，第1卷第1期（創刊號），1931年4月。引自吳世勇編：《沈從文年譜（1902-1988）》（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頁94。
- ⑯ 沈從文：〈政治與文學〉（未完稿），載張兆和主編：《沈從文全集》，第十四卷（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頁254。
- ⑰ 沈從文：〈論郭沫若〉，載張兆和主編：《沈從文全集》，第十六卷（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頁153-60。
- ⑱ 姚卿祥：〈學者在北平：沈從文〉，《益世報》（天津），1946年10月23日。
- ⑲ 沈從文：〈從現實學習〉，載張兆和主編：《沈從文全集》，第十三卷（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頁390-92。
- ⑳ 沈從文：〈一種新希望〉，載《沈從文全集》，第十四卷，頁279-80。
- ㉑ 〈施蛰存的一封信〉，《文匯讀書周報》，1992年11月21日。
- ㉒ 胡繩：〈為誰「填土」？為誰工作？——斥《大公報》關於所謂「自由主義」〉，《華商報》，1948年2月22日。
- ㉓ 李輝：《蕭乾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頁280。
- ㉔ 郭沫若：〈提防政治扒手〉，《華商報》，1948年3月15日。
- ㉕㉖ 蕭乾：〈中國文藝往哪裏走？〉，《大公報》，1947年5月5日。
- ㉗ 蕭乾口述，傅光明採訪整理：《風雨平生——蕭乾口述自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213。
- ㉘ 文潔若：《我與蕭乾》（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2），頁8。
- ㉙ 蕭乾：〈人道與人權〉，《大公報》，1947年7月23日。
- ㉚ 蕭乾：〈吾家有個夜哭郎——五千歲這個又黃又瘦的苦命娃娃〉，《大公報》，1947年10月21日。
- ㉛㉜㉝ 蕭乾：〈自由主義者的信念——關妥協騎牆中間路線〉，《大公報》，1948年1月8日。
- ㉞ 蕭乾：〈華盛頓精神的不朽——頌埃森豪元帥的風度〉、〈政黨·和平·填土工作——論自由主義者的時代使命〉，《大公報》，1948年1月27日、1948年2月7日。
- ㉟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收入《茅盾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茅盾全集》，第三十五卷，〈回憶錄二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頁629-30。